

实然的超越和应然的解说：图书馆学如何提高学科地位

傅荣贤

摘 要 对图书馆实践的狭隘认识以及对图书馆学研究中科学理性方法的过度迷恋,导致图书馆学研究只能在实然的层面上讨论图书馆之所“是”。完整的图书馆学研究必须体现实然和应然的双重自觉:既要建构一个旨在直接回应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等具体操作的实然的学科知识体系,又要通过对文献背后文化的思考,追问人类文化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形成关于文化的超越性认识和无限性洞见。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从感性经验的实然事实层面延展到本体反思的应然价值层面,图书馆学才能建构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学术领域,提供能够其他学科所共享的自主性成果,从而真正提升自身的学科地位。参考文献 29。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学科地位 实然知识 应然知识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the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library services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methods in th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the library science study can only discuss the library as it “is”. As a matter of fact,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must reflect the double self-consciousness of what is and what ought to be.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build a disciplinary knowledge system as is, which can directly respond to the specific operation of collecting, organizing, storing and using resources, but also to pursue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human culture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e behind the resources and achieve the transcendental awareness and infinite insight of culture. The course of library science development shows that only by extending from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fact as is to the ontological reflection of the value as ought to be, can the library science establish an academic field with the internal logic unity, provide independent results that can be shared by other disciplines and truly improve its own disciplinary status. 29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Disciplinary status. Knowledge as is. Knowledge as ought to be.

CLASS NUMBER G250

图书馆学研究者心中有两大“永远的痛”：一是图书馆学是否已经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尚存疑问；二是图书馆学在学科大家庭中地位不高，这两者是紧密相联的。诚如文献[1]所指出的，“图书馆学至今尚没有实现科学化，没有在现代学科之林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受到界外的漠视与界内的质疑”。这其中包括图书馆学“为什么没有”以及“怎样才能”取得应有的学科地位等更为基础性的议题。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

1 图书馆学为什么没有取得应有的学科地位

完整地把握图书馆实践的的内涵,有助于厘清图书馆学理论思考的范围与层次,确立图书馆学的应有旨趣,从而建构完整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并最终为学科地位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目前对“图书馆实践”的片面化认识,正在人为地压缩图书馆学理论思考的可能空间。

1.1 没有完整地把握图书馆实践的内涵

图书馆的实践依赖性决定了图书馆学理论必须是紧扣图书馆现象和问题而形成的自觉认知,理论的唯一目的就是引领实践从自发走向自为。一旦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和指导不能达到某种理性效度,往往就会遭到脱离实践的责难。然而,“实践”的确切含义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当前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就图书馆学理论界和图书馆实践界而言是有不同解读的:理论研究者认为,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理论研究要关注图书馆在社会现实中的处境;而实际工作者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则是指图书馆学理论要能够直接解决图书馆的具体实际问题。”^[2]不仅如此,至少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似乎还没有哪门学科成功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这启发我们检讨目前关于“实践”概念的认识是否完备和恰当。正像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的“实践”长期被人们所误读一样,图书馆实践的真正含义也没有在完整的层面上为人们所认识。狭隘和片面化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从“实践与认识(包括理论和真理、逻辑等全部精神性的内容)的简单对立角度出发,把本来作为实践内在本质要素的精神性内容排斥在实践概念之外”,从而导致“实践与真理与认识的某种分离和对立,真理和认识仿佛是实践以外的东西”。然而,实践并非只是“操作意义上的片面的实践”,它还应“包括理论和真理、逻辑等全部精神性的内容”^[3]。

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以“是”与“应当”区分事实与价值的界限。“是”与“应当”分别对应于人类迄今为止形成的两大类型的知识积累: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比如,图书馆学即包括器物和技术层面上的事实知识,以及学理和精神层面上的价值知识,因而既是认识论也是本体论。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形上与形下、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认识与体验、语言的表述与语言的表达、物性与心性等等,都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人类知识积累的这两个维度。总体而言,前者是自然的因而是有规律的;后者是自由的因而是有目的的。这两类知识都是人类

实践的产物,“实践不仅是认识论的基石,也是价值论的基石”,“认识的发展、观念的变革、价值的革命、哲学的转型,无不是在实践中酝酿出来,并在实践中确立和巩固起来的”^[4]。因此,实践不仅指涉具体的操作行为,也关乎精神层面上的抽象认识和价值反思。图书馆实践需要实然的事实知识和应然的价值知识的双重呵护,两者的分工大致是:前者生成旨在直接指导现实操作的实然知识,例如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的实践操作需要相应的藏书建设和信息采集技术、分类编目技术、文献组织与检索技术等事实知识的回应;后者则涉及到对图书馆的理想塑造和精神提升,致力于思考图书馆应该为社会文化和价值秩序指定怎样的思考向度和超越旨趣,而事实上“有关图书馆的目的、意义、功能,一直是不同时代、不同图书馆学家探讨图书馆时必须做出的第一判断”^[5]。这两类知识的积累、融合和分化是图书馆学的主要成果,也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渊源。作为对研究对象之应然本质的解说,价值知识是在非现实和非直接有效的层面上呈现的,不能简单地要求它们在现实性和是否“有用”的表象层面上与研究对象达成一一对应。但是,价值知识又是重要的,正是价值知识决定了以文化为中心、以人为对象的图书馆既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责任先于事功应该成为图书馆的精神追求。而单一层面的实然知识强调“必然规律”,因而毫无责任和操守可言。

只有当图书馆学与“包括理论和真理、逻辑等全部精神性的内容”在内的整体性(而不是“操作意义上的片面”)实践相脱离时,我们才能宣称某种理论脱离了实践。因此,有关“图书馆是什么”的事实命题和“图书馆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命题都是图书馆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实践”内容。某理论是否脱离了实践,并不取决于该理论提供的是实然的事实知识抑或是应然的价值知识,而要看该理论的具体研究结论在解释不同层面的图书馆实践时的效度。例如,迄今为止,正式和公开出版的文献始终是图书馆工作的主要对象,而人类文化的主体正是记录在正式和公开出版的文献之上。这样,能否解

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人类文化成长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应成为图书馆学的基本论域——尽管它与“操作意义上的片面的实践”相脱离。又如,狭隘“实践观”视域下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将永远是脱离实践的,从而也把图书馆实践活动简单地理解成了没有能动性和精神性的物理意义上的操作行为。显见,片面的实践观把功用和效度视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动力,只能基于实然状态讨论图书馆之所“是”。因而,有关人类文化的发展问题并不被视为图书馆学研究的目标,对图书馆品位的追求也变得无足轻重。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6]同样,我们相信,作为人类文化的理想维度,图书馆学中的应然知识能够消解对“事实”的“消极默认”,并在信念层次上对人类文化给予某种引导和规范,成为提升图书馆学学科地位的根本因素。

1.2 过分迷恋单一向度的科学实证方法

文献[1]认为,造成图书馆学学科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过程理性精神的匮乏”。而“理性”的实质是科学,“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7]。目前,对科学理性方法的吁求我国图书馆学界的主流声音,尽管学者们的用语表述不尽相同。文献[1]的“理性”、文献[2]和文献[5]的“实证”、文献[8]的“抽象图书馆学”、文献[9]的“现代性”等等,究其实质,无一不是对图书馆学研究中科学理性方法重要性甚至唯一性的“不懈陈辞”。例如,文献[2]即指出:“只有实证研究才是迅速提高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科学性和可靠性的基础。”

然而,从实践的两重内涵来看,科学理性方法只能提供与“操作意义上的片面的实践”相对应的实然的事实知识,而不能提供与“理论、真理、逻辑和感觉等精神性内容”相联系的应然的价值知识。因为,重视“实证”的科学理性方法是“建立在现实的图书馆活动的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5],它以“事实”为依据,因而也恪守着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确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真

理标准。和所有近现代其他“科学”一样,这样的图书馆学因否认了实践的价值论内涵而只能提供工具理性(reason),不能提供价值理性(rational),本质上“是不可能终极意义的”^[10]。只有在实然事实知识的基础上构建超越经验实证层次的应然价值知识,才能构建完整和成熟的图书馆学,并为学科发展提供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指导,保证图书馆学在学科大家庭中实现自主的知识组织和有效的知识存现。

学科地位是由学科影响因子决定的,它往往是某学科中能够为其他学科所共享的普遍性知识作用的结果。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似乎更需要通过那些无法实证的应然知识才能提高学科影响力。例如,语言学并不只是局限在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等语言内部层面,仅仅通过音位记音法、词义分析法、词源考证法、语法学研究等语言内部境遇知识的积累而成为“一门领先的科学”^[11]的。历史上,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把人类语言行为区分为社会性的、具有共同和普遍特征的“语言”(langue)和个别性的、具有境遇特征的“言语”(parole)。他认为普遍性的语言比境遇性的言语更重要,并致力于语言符号系统结构特征的研究,从而“突破”了境遇性的言语知识。他的结构主义学说也因此而被誉为“方法论中的一场哥白尼革命……许多人文科学领域竞相使用结构主义研究方法”^[11]。同样,乔姆斯基的结构语言学之所以能够“在数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广大领域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2],是因为乔氏“放弃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归纳法”^[11],不再把语言学视为关于语言事实之描写的经验科学。我们相信,长期信奉科学实证方法,是图书馆学学科地位不高的根本症结所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或客体之物,表述的是经验事实,所提供的只是实然知识。“经验论者和实证论者总是主张,人类知识的最高任务就是给我们以事实,而且只是事实而已。”^[6]不仅如此,“科学”还根据实证分析和逻辑推导,“宣判一切自称超越经验的所谓知识为无意义”^[13]。于是,科学“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14]。正像物理学只关注物理学的

事实、化学只关注化学的事实一样,图书馆学也只关注“馆内”看得见的实然事实,片面地认为“思辨理论造成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虚化与泛化,它既不能合理地解释现实,又不能科学地预见未来,难以发挥理论的作用;它脱离现实,难以找到与实践沟通的桥梁。”^[1]无疑,科学视野下的实然知识具有局限于“馆内”具体业务操作的境遇性特征,只能解决图书馆内部的自身实践问题。这样的图书馆学不仅是不完整的,其相关成果也很难为“馆外”的其他学科所共享。例如,关于图书分类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总体上有两种认识^[15]。其中,以“图书馆藏书的分类问题”为研究对象,只能形成解决馆内藏书分类问题的境遇性知识;而立足于“一切知识的载体的分类”则直面人类主流文化的全部,形成对人类自我创造的文化的反省与思考,因而也构成了人类观照文化的一种尺度。

2 图书馆学研究应该体现实然与应然的双重自觉

图书馆学需要实然知识和应然知识的双重呵护。一方面,要建构一个旨在直接回应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等具体操作的实然的学科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对文献背后文化的思考,探究文化发展的一般问题,反省现有的文化模式,勾勒人类文明的应然未来。图书馆学只有超越实然知识的本能指向,进入无限扩展的应然领域,才能肩负更大的学术担当,从而促进自身学科地位的提高。图书馆学史的发展历程生动地显示了应然性的价值知识对于提升图书馆学自身学科地位的重要作用。

2.1 图书馆学学科地位的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的图书馆^①基本上是一个兼有技术、价值和信仰的统一范畴,而古代图书馆学研

究的主要目标正是要论证三者统一的必要性及其可能方式。清儒章学诚《校雠通义·序》指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深刻地指出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文献整理内容的三个方面:一是有关“部次条别”的书目检索,它对应于以操作为指向的具体技术;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内容,其最终目的是要提供规划和度量文化的尺度;三是有关“道术”诉求的理想信念,其实质乃是有关文化的应然旨趣以及人之为人的“最高”知识。章学诚在总结刘氏文献整理思想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兼具实然知识和应然知识之双重自觉的完整体系:在回应具体文献工作的实然知识的基础上,观照社会文化,模铸人们的文化信念乃至伦理操守,从而最终在观念层面上营造一个集知识、文化、价值和伦理多位一体的学理结构。虽然二刘以“中秘”所藏文献的整理为起点,积累了“广罗异本”、“校勘文字”、“条别篇章”乃至“互著”、“别裁”等实然知识,成为后世藏书整理实践的楷模,但真正使他们名垂青史的并非这些直接指导文献整理实践的境遇性知识。他们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检讨当时文化的总体面貌,强调文献背后文化的有机统一性,从而在文化反思的基础上给出关于文化本身的学术定位与哲学思考。总之,他们不仅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有关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境遇性知识,而且还揭示了图书及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从而完成了普遍性价值知识的勾勒。他们的《七略》既成为“求周秦学术之源流,古昔典籍之纲纪”的“津逮”^[16],又提供了对文化的整体性考察和无限性洞见,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文化接受和文化理解。后人对刘氏的服膺也不在于他们发凡起例的校雠目录学的境遇性知识和技能,而在于他们提供了一个基于文献整理的

① 迄今为止,仍有许多学者坚称中国古代既没有图书馆更遑论有图书馆学。我们认为,中国古代从事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活动的藏书机构虽然与西方的 library 并不全然等同,但并不妨碍我们称其为“图书馆”。而基于数千年图书馆实践,我国古代也必然形成了图书馆学的理论思考。而如果一定要用西方学术概念来苛求,中国古代恐怕连哲学、文学甚至数学等也不存在。

文化秩序和人伦理想。清儒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汉艺文志考证》认为,“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而所谓“汉《艺文志》”正是以刘氏《七略》为蓝本“删其要”而成。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学术”一词“和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关系非常大”^[17],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命题都深刻地指出了图书分类与学术文化的密切关系。而这与刘氏的文献整理理论渊源甚密。班固《汉书·楚元王交传》认为刘氏目录不仅“别九流”,而且还“叙鸿烈”。龚自珍《定庵文集·六经正名》曰:“微夫刘子政氏(今按:刘向字子政)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章太炎则指出:“仲尼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歿,名实足以抗者,汉之刘歆。”^[18]认为刘歆《七略》的历史功绩堪与孔子《春秋》相颉颃。显见,由《七略》肇端的古代图书馆学从一开始即具有与文化的本性 & 社会人伦相融合的视域与境界,充满了应然性的超越性内容。与此同时,由二刘“代言”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地位也非常高。例如,清《文渊阁记》引用宋儒张载的话认为,作为藏书机构的文渊阁应该努力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本体论高度。

近代以降,在西方“科学”图书馆学的影响下,中国的图书馆学也发展为以理性为原则、以主客体二元分立的逻辑明证性为基础的关于“事实”之实证的知识论模式。相应地,那些“不在场”的应然性价值知识被直接的现实和世俗的兴趣所取代,古典主义的超越性旨趣成为需要自我辩护的不合时宜的某种操守。于兹而还,图书馆努力以最经济的方式向普通读者传递最全面、最准确的文献信息,图书馆学的全部学理和旨趣则直接指向信息传递的预期效率最大化,即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或“帕累托有效”(Pareto Efficiency)。“在场”的实然事实知识成为主要甚或唯一内容,图书馆学的功利目的达到极致。例如,沈祖荣、胡庆生、杨昭愬、洪有丰、杜定友、刘国钧等,“他们中大多数人研究图书分类、编目、索引与文献学等图

书馆技术问题”^[19]。然而,实然知识无法提供现实图书馆所不可或缺的价值理想,未能从根本上提升图书馆的品质以及图书馆学应该具有的深层意蕴。随着对实然知识的诉求被推崇到不恰当的高度,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不升反降。1957年刘国钧的《什么是图书馆学》^[20]一文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图书馆学的质疑而撰写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图书馆学令人堪忧的现实地位。而努力证明图书馆是“学”,也成为近现代学者的“崭新”课题,这和不需证明而学科地位反而很高的古代图书馆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相信,局限于实然事实知识的近现代图书馆学即使能够完成学科自证(证成图书馆是“学”),它也将不可能赢得类似人们对刘氏《七略》的礼赞。

进入20世纪下半叶,随着计算机在图书馆中的运用,学者们愈益认识到提升图书馆(学)的本体品质并指证它们的崇高价值的重要性。这种提升和指证的努力大致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对未来“理想”图书馆的设计,要“回答的是‘图书馆应该怎样’的价值命题”^[5];二是以图书馆哲学的名义描绘图书馆的可能境界。尽管这两个向度迄今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绩,但学者们无疑意识到了下述学术诉求的必要性:超越实然,努力为图书馆学注入精神动力,建构一个应然理想的可能图书馆学世界。

2.2 图书馆学实然知识和应然知识的辩证关系

几乎和所有其他学科一样,图书馆学中的实然知识是基础,应然知识是升华。两者不是对立与排斥的关系,而是手段与目标、形下之器与形上之道的关系。其中,图书馆学的应然知识并不直接回应现实图书馆的具体操作,因而不以是否有效地作用于图书馆物理世界为思考支点。但是,应然知识必须在对图书馆“现实”因素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实现反思,才能颠覆实然知识的“事实”局限。因此,重视对图书馆学应然价值知识的建构,并不意味着对实然知识的排斥,它只是不停留在实然知识的层面之上。事实上,实然知识提供了图书馆学的身份

确认和学科本位,图书馆学专业合法性的获得,正是通过藏书建设、知识组织等图书馆基本业务和技能的研究而实现的,集中反映了并非门外汉也可以对图书馆问题行使同等的话语权。例如,古代的“互著”首先是关于书目著录的技术知识,恪守着实然事实的境遇性,即章学诚《校讎通义·互著》所谓“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著,以便检稽”,从而显现实践效度;然后才谈得上“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兑现其超越层面上的应然价值。对“别裁”等其他概念的分析将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这深刻说明,只有对实然的专业概念与操作技术有了深切领悟之后才谈得上对应然性价值知识的进一步诉求。因此,追求应然的事实知识本身并没有错,但当图书馆学自限于实然层面的“事实”限度,从而放弃对应然知识的更高追求时,则必将受到挑战。这在实然知识的手段异化为应然知识的目的、形上之道日益为形下之器所消解的当代表现得尤其突出。

3 图书馆学应然知识的可能内涵

目前,图书馆只是被定位在狭隘的知识传递的层次之上。相应地,图书馆学主要围绕知识组织的一般理论、方法和原则而从事“事实”研究。然而,人类文化主要是记载在公开和正式出版的文献之上。以公开和正式出版的文献为对象的图书馆,乃是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人类主流文化的机构。图书馆学应该在文献整序的基础上,反思文献背后的文化,追问人类文化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形成关于文化的超越性认识和无限性思考。由此,图书馆学才能突破“馆内”境遇性知识的操作维度,为各种具体的文化和人文研究提供学理基础和价值参照,从而真正提升自身的学科地位。其具体内涵应包括:

3.1 为文化理解提供独特的学科参照

图书馆学在为纷繁复杂的文献提供秩序性和统一性的同时,形成了关于文献背后文化的

独特学科视界,它涉及并影响到几乎所有领域的文化理解。以我国现存首部书目《汉书·艺文志》为例,其中的《六艺略》著录“易经十二篇”,而《数术略》又有“《周易》三十八卷”,表明今传《周易》一书在西汉时期只被称为“易经”,“周易”之名另有所指;《兵书略》著录“《蹴鞠》二十五篇”,表明古代的“蹴鞠”不仅是指用脚踢(蹴)那个“以韦为之,实以物”的球(鞠)的足球运动雏形,而且还是“陈力之事”,承担着“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的军事训练职能。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人类文化的传承基本上是依靠一个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为复杂的信息传播系统。而文献系统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因此,图书馆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完整体系乃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主要中介,透过历史上不同的图书馆学成果能够认识到具体时空条件下文化的某种基本存在状态。例如,《中图法》基本部类的设置以及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排列先后的认识,集中反映了在图书分类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宏观审度,具有独特的学科认识价值。另一方面,图书馆学不仅被动地记录和反映文化,而且还积极地参与文化的建构和创造。例如,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将先秦诸子总结为道、儒、墨、名、法、阴阳六家。梁启超指出:“刘歆《七略》踵谈之绪,以此六家置九流之前六,然以通行诸书未能尽摄也,则更立纵横、杂、农、小说四家以广之,彼为目录学上著录方便计,原未始不可,若绳以学术上分类之轨则,则殊觉不伦。”^[21]依梁氏之见,司马谈将诸子分为六家是正确的,刘歆别为“九流十家”只是出于书目分类的权宜之计,并不符合学术实际。但由于图书馆学的导向作用,至今流传的是“九流十家”而不是“六家”。显见,图书馆学在文化建构与文化认知上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形成了基于学科视角的人类文化的反向观照。又如,1904年徐树兰《古越藏书楼书目》以“存古与开新”为宗旨,“平等对待古今中外书籍。其目于中外学术也基本做到了平等立类”。该目“开近代图书馆编目之先”^[22],通过对中西文献的统一分类,寻求中西文化的融通,从而提供了一种关于文

化理解的学科视景。

然而,图书馆学迄今尚未在文化研究问题上充分展示自身的价值。例如,目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定论都是由文史研究者提供的,以文献为对象、以文化反思为本位的古代图书馆学并没有显现出其应有的话语权。

3.2 为文化反思提供独特的学科尺度

图书馆学不仅是对现实文化的默认、总结和肯定,而且还对文化进行批判、超越和改造,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历史上,刘向父子主要以清算“不复仲尼法度”的文化现实为目标。相应地,以“仲尼法度”为旨归反思各种类型的文化遂成为刘氏文献整理的题中应有之意。他们以文献整理的实践境遇为依托,反思文化的自明性前提,为重新理解文化提供了可能向度。同样,20世纪初的“新图书馆运动”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目标,紧扣文化危机、文化转型、文化建设等主题展开,从而提供了一种基于图书馆文献活动的文化选择: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引进和借鉴西方近代文化。1896年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云:“国家欲自强,以多读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集中反映了这一文化选择。

“文化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是不断超越、不断创造的,没有了文化的创造,文化就会陷入教条和僵化,变成压抑和束缚人的异己化存在。”^[23]如何改变现实文化并在实践的层次上影响人们的文化认识,应成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今人类文化正在被西方式的知识论神话所左右,而知识论的自蔽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24]。由此,“知识”日益成为纯粹理智性的算计和操作技术,科学技术成为知识的主要内涵。崇尚“知识”,并在相应的分科研究中专题化为对具体对象的探索,这一思路“隐含着科学对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各个部门的一种霸权意识。这就是‘接近’于本质的知识比‘远离’本质的知识拥有更多的真理;而掌握较多‘客观真

理’的文化优越于较少‘客观真理’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在价值上优越于‘非科学’的文化”^[25]。套用哲学的语言来说,用知识取代文化,乃是把包罗万象的存在(being)当作了物理学意义上的实在(substance),它切断了文化的生命之根,使得鲜活的文化只能以僵硬和教条的知识面貌存在。其次,“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设计”,强调知识的工具理性价值,而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就是金钱”理念则强化了知识的功利取向。“求知”的心理动因自觉地服务于经济利益,成为与提升个人品德与促进人类进步无涉的单向度追求,从而导致人类赖以界定自身行动目标的价值理性相对萎缩。有知识的人完全可以没有德性,而这已经不幸成为当今社会不争的现实。

文化大于知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图书馆应该以实现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为目标。与知识相比,文化始终以人及其能动性为中心,人的主体精神性和现实情境性决定了文化的价值性、动态性和多元性,由此形成了一个有目的、责任和正义的人的心性世界。在文献的文化内涵长期为显性的知识所遮蔽的今天,图书馆学研究应致力于反思知识论的局限,表征文化的理想秩序,引领人类从“知识”表象回归到“文化”本体。我们相信,图书馆的馆藏对象——文献——作为作者个人心性的产物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集中反映了人类文化的成果。事实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已经经历了从文献到信息到知识的逐步深化^[26]。正像信息说取代了文献说,知识说取代了信息说一样,我们能够预期,知识说将被文化说所取代。立足于文化的图书馆学应该将研究中心从文献背后的知识传递转移到文献背后的文化传承上来,由此形成两个具有前瞻性(而不仅仅是反思性)的命题:文献是记录一切“文化”的载体,而不只局限于记录合乎“合理的判断”和“系统的阐述”的知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知识在内的“文化”,亦即在功利性的知识之外还包括人的道德情操、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等德性和品格内涵。无

疑,一旦图书馆学完成了从“知识”到“文化”的转向和自我证明,图书馆学将能够提供批判和引领时代精神的普遍性成果,并成为提升自我学科地位的有效路径。

3.3 倡导中华民族的自我文化自觉

图书馆学史表明,只有诉诸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视野,重视各种类型文化的对话与学习,才能建构多元文化的有机统一与综合平衡。例如,“仲尼法度”作为西汉时期具有公度性价值的文化立场,并不是通过“焚诗书”或“罢黜百家”而实现的。相反,它是在“兼儒、墨,合名、法”,充分肯定百家之学的独特价值的前提下,通过“对话”达致的。《七略·诸子略序》认为诸子之学“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另外,“各引一端”、“辟犹水火”的九流十家也是有机统一的。他们彼此“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形成了《易经》所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虽对立却统一的有机范型。刘氏对诸子的这种宽容与尊重,本质上是相信个别文化对普遍文化皆有贡献,具有平等的参与机会,从而确立了多元并存的文化理念,集中反映了文化价值中公度性与差异性的对立统一。又如,清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办理四库全书圣谕》特别强调,除了要收“羽翼经训”的文献之外,“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者亦在收罗之列。把各种特殊的文化类型视为共同文化价值立场的具体表达,强调多元化是文化发展的生命所在。显见,古代图书馆学不仅表达具有公度性价值的文化立场,而且还倡导个性文化价值,并在共识性前提下引导各类型文化富有个性的发展。

当今世界文化的主流是西方的“知性”文化。这种西方式的强势话语正在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梗阻,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究其实质乃是西方中心的一元论文化的危机。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相信,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传统,世界不能没有她的参与”^[27]。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亨特·罗林斯教授在第二届北京论坛上发言指出:“我们已经发现了必须

始终铭记的一句话:我们双方(今按:这里是指中美两国)都有很多东西可教,也有很多东西可学。”^[28]无疑,充分挖掘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有助于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中国图书馆学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反省类型,对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价值的揭示,能够提供中国文化在建构人类普遍文化价值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例如,图书馆学中的知识组织不仅提供文献检索的工具效用,而且还能够超越工具层面,表达更高的内容。从工具理性来看,人类用于整序文献的知识组织工具主要包括语法化的人工语言(如DDC)和语义与语用化的自然语言(如清代的《四库总目》)两大类型。从价值理性来看,知识组织工具在整序文献的同时,也整序了文献背后的文化。知识组织的基本态度和策略,也是相关文化的态度和策略:语法化的人工语言墨守逻辑理性原则,将思维的明证性确定为衡量一切文献的尺度,本质上表明文献背后的文化是一种实然的物理存在,可以用机械的方式予以组织;语义与语用化的自然语言本质上表明文化是一种意义性和价值性存在,必须以一种动态的意义去理解它们,并设法表现出它们的价值和深度。它从主体的角度打量文献,指呈文献背后的文化回归主体尺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方式^[29]。在语法化的知识组织模式长期独步中西的今天,合理借鉴和倡导中国古代语义与语用化的自然语言,有助于证成下述一些重要命题:文献并非从学科属性、逻辑类项、物理形态上予以打量的纯粹客观之物,而是包含有与主体人的心性有关的“德性”内容;读书学习并非只是为了“求知”,它还与人们的文化修养相联系;一个人的成才需要全方位的素质和修养,不能单靠知识一个方面,等等。这样,倡导中国的知识组织模式,也是倡导中国文化的认知和表述方式,有助于颠覆西方式的知识论局限。

4 结语

古往今来的所有图书馆都是具体的,每一座图书馆的实藏文献也是有限的。但图书馆学

除了要生成基于具体图书馆及其现实馆藏的境遇性的实然知识,还应生成普遍性的应然知识,提供关于人类知识、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的无限性思考。例如,上述有关知识组织的研究一旦“突破”了实然性境遇知识的维度,就完全可能在文化的意义上表达某种更深刻的内涵,并构成一种把握人类文化的特殊方式。尽管应然知识不能直接有效地作用于图书馆的操作实践,但却可以营造一个基于图书馆学独特理解的人类文明和观念领域,构成一种关于文化信念、价值操守的精神力量。由此,图书馆学能够丰富并实现有关人类文化与人类自身的反省,从而也成为提升自身学科地位的必由进路。

参考文献:

- [1] 李林华,金明生. 理性与我国科学图书馆学的构建[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4):14-18.
- [2] 刘兹恒,高丹. 构建面向职业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第五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综述[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3):78-81.
- [3] 邵腾. 整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纪念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而作[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4):17-23.
- [4] 李振纲. 哲学的本命:思想如何改变世界[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10-115.
- [5] 邱五芳. 中国图书馆学应进一步弘扬实证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1):16-21.
- [6] [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107.
- [7] 刘大椿. 科学哲学通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21.
- [8] 叶鹰. 抽象图书馆学的分析化[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6):71-73.
- [9] 于良芝. 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J]. 图书馆杂志,2005(4):3-7,20.
- [10]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 许良英,等,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562.
- [11] 李开. 论现代理论语言学的科学方法意义[J]. 南京社会科学,1990(5):88-91.
- [12] 童之侠.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J]. 现代传播,2002(2):63-66.
- [13] 洪谦. 逻辑经验主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31-32.
- [14]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 张庆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5.
- [15] 俞君立. 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31.
- [16] [清]姚振宗. 汉书艺文志条理:卷1[M]. 二十五史补编本.
- [17] 李零.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2.
- [18]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424-425.
- [19] 范并思. 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208.
- [20] 刘国钧. 什么是图书馆学[J].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1):7-17.
- [21] 梁启超.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A]. 梁启超全集[C].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696.
- [22] 彭斐章. 目录学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0.
- [23] 王国维. 文化哲学的问题域限[M]. 求是学刊,2006(4):12-15.
- [24] [美]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 高钰,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95-196.
- [25] 钱宁. 后哲学文化对知识论的真理观超越[J]. 社会科学战线,2003(2):244-246.
- [26] 杨晓农. 近20年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三次嬗变[J]. 情报资料工作,2007(5):12-15.
- [27] 杜小宁.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50-51.
- [28] [美]亨特·罗林斯. 现代研究型大学:知识创新者与文化桥梁[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0-13.
- [29] 傅荣贤. 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学研究[M]. 台北:学生书局,1999.

傅荣贤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通讯地址:哈尔滨. 邮编 150080。

(收稿日期:2008-12-31;修回日期:2009-01-08)